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刘兰兮 主编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 企业发展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刘兰兮 主编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 企业发展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
人民出版社, 2006. 1
(中国经济史丛书)
ISBN 7-211-05143

I. 中… II. 刘
集 IV. F27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中国经济史丛书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
ZHONGGUO XIANDAIHUA GUOCHENGZHONG DE QIYE FAZHANG

主 编: 刘兰兮
责任编辑: 吴锦通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625
插 页: 4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211-05143-4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经君健 郑学檬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一件有多方面意义的举措。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之一，闻之无不倍感鼓舞。经济史学既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所以经济史学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曾是国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在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就曾起过重要作用。多少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曾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而站得更高，并在观察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角度去反思、去剖析，准确地把握国情，科学地作出判断。所以，要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就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事之必然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某些经济史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讨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虽然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论思维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仍不能否认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术界“悟诸未悟者”。但是更多的经济史学者，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遵循经济史学自身的规律，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各个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他们的工作，不仅为后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史料基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

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突破了“左”的、极“左”的思想禁锢，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迎来了学术界的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主旋律的推动下，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硕果累累，新人辈出。年长的学者老树开花，总结多年的积累，写出长期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中年学者思想成熟，精品迭出；特别是日益增多的青年学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好成绩，有厚望焉！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国外史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中外学术文化、教育交流的频繁，老、中、青学者都以开放的、求实的态度吸收外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因而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的扩展。

在以上所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诞生了，一如雕龙跃笔海，彩凤栖文峰，令同行艳羡不已。这套丛书是百家争鸣的园地，是经济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施展才华的空间。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既有以实证为基础，运用多种方法的扎实研究，也有逻辑严密、精辟深邃的理论探讨。希望这套丛书在学术上能做到兼收并蓄，并以多种风格的论著并存为特色，而严谨的学风则应该是丛书最重要的选择标准。

“青春去住随柳条，欲寄来人以为信。”祝贺“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并相信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精品文库，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2005年6月

序

吴承明

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历史学科研单位和大学院系，开始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各类大型企业的档案资料，工商行业的契约文书，以及有关人员的口述记录，着手研究企业、行业的历史。惜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干扰，到80年代才陆续完成，出版有企业、行业、工商团体和人物的历史、史料书五六十种。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今后企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90年代，本学科的研究向企业管理学和经营学方面发展，并由微观到宏观，特别在资本组织、集团化、市场营销、价格政策以及经营战略方面，成绩斐然。近年来，本学科的研究颇受新制度学派的厂商理论和经济史学说影响。新制度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兴衰受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制约，也受新的制度思想的诱导。这在近代中国，就集中表现在传统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上。为此，学者对我国传统企业的组织和运作进行深入探讨，重新评价它在向现代化过渡中的作用，又对不同历史时期新旧制度的交替和过渡的中间模式作了比较研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由正式制度（法令、规章）的研究向非正式制度（伦理、习惯、价值观）发展，注意到人文因素和企业文化。这就大大扩充了企业史的研究领域，并有助于探讨当前我国企业现代化的途径。

本书辑录的23篇论文，都是提供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

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学术讨论会的新作。这次会议曾就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进、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企业发展与外部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论文作者大都属新一代的经济史学家。他们各有专攻，积累有丰富的史料和治史经验，论文概取实证主义，并有不少新发掘的资料，弥足珍贵。他们思想开拓，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文章富有创造性，论点犀利，读之爽然。论文概括了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多方面的前沿问题，堪能展示本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辑之成书，贡献粲然。承本书主编嘱我作序，欣然命笔。唯以耄耋之年，兼患目疾，未能遍览全书，仅就注意所及三个问题，略述读后感，亦恐老朽所见，未免偏失也。

一、国家资本在我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中一直居于举足轻重地位，自晚清的洋务派企业至今天的国有企业皆然。然而，它们的资本组织，它们与政权的关系，它们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各历史时期颇不相同。从制度经济学看，这是属于体制的变迁。过去学者对于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办、官督商办、特许制度的企业，已有详尽的研究。本书《试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三种类型》一文，则是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作者从资本组织形式上，举1935年改组的中国银行为国家参股型代表，1934年创建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为国家直接投资型代表，1948年改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部分出售国有股份型代表。尽管资本组织类型不同，它们都是国家政权控制的企业，因定名为“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对于过去的官办、官督商办来说，已是一种新的体制了。这些企业资本较巨，内部管理较先进，效率也较高。突出者如中国建设银公司，利用控股制度，在三年内开办了五家电厂、四条铁路，拥有煤矿、棉业、木业公司，1936年纯益达191万元。从它们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

“统制经济”的效益说（这是它们的主要功能），远超过已往的任何国家资本体制；然而，它们在集资和经营上主要依靠官场人事关系，置《公司法》于不顾，距离规范的股份制企业相差远甚。

本书《略论抗战时期内地省区企业公司的制度特征》一文，则是考察 1939—1943 年蓬勃出现的 15 个省区的“企业公司”，连同 1933 年设立的西北实业公司共 16 家。它们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辅之以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家银行的投资，成为国家资本的一种新的体制。它们都采用控股制度，经营业务广泛，形成母子体系。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它设立三年来已有自办、合办、投资的企事业 28 家，遍及工矿、农林、运输、商业、金融、勘探，实际运用资本达注册资本的 2~3 倍。作者认为，这种企业公司的出现固然与战时环境有关，但从企业发展史看，它实属中国公司制度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投资公司、控股公司阶段。在这些企业公司中，已有较为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些公司中并有“政企分开”的迹象。特别是那些原由省府直接经营的企业，往往陷于困顿，作价卖给企业公司后，摆脱行政命令干扰，立即恢复生机。唯抗战胜利后，各省区企业公司多陷于分崩离析，为中央控制的垄断性国家资本所取代。

二、传统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过渡，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中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过去已有研究，尚不够全面。本书《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一文，考察了南洋侨汇市场中侨批局与中国银行（闽行）30 多年来竞争与合作的历史。现代化的银行不能一举取代传统的侨批局，因为后者有侨民和侨眷都喜爱的信款合一、送款到家、代写回信（侨眷多文盲）等服务，形成一种乡情横溢、安全可靠，甚至“盗匪相戒不劫信差”的不成文制度。同时，银行也有它资金雄厚、调度灵活、掌握汇率信息等优势。于是银行学习侨批局的

人文精神设侨汇科，与侨批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两者由竞争、排斥变为合作、共生关系，共同对发展侨汇市场作出贡献。作者结论说：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中，不同市场各有它最佳模式。侨汇是一个侨民与侨眷构成的特殊群体的市场，银行与侨批局共生就是最佳的过渡制度。那种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的“取代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传统制度中的积极因素。

本书《银行的“钱庄化”与钱庄的“银行化”》一文，研究了19世纪晚期上海新式银行建立时常要借助于钱庄的资金和业务人才，在贷款、票据清算、纸币发行上严重依赖钱庄，被称为银行“钱庄化”，而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钱庄业务日趋“银行化”，如做抵押放款，增设储蓄、信托、票据承兑业务，甚至改合伙为股份有限。作者指出：银行的钱庄化实际是由西方引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本土化”；而钱庄的银行化则是传统企业的“现代化”。两者方向相反，但都是必要的。现代企业要吸收传统制度的优良因素，传统企业要向现代制度发展。半个世纪以来，银行与钱庄就是以这种“双赢”的方式各自为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课题。非正式制度中又以意识形态最为重要，而在中国，就主要是儒家思想在企业发展史中的作用。本书《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一文，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企业经营最大的是义利观和家族观，两者结合成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实为近代民营企业经营的理念。这种理念，强调人的品质，重视人际关系，有利于集中管理和企业的稳定；提倡勤劳、节俭，强调诚信，讲礼法，重情义，有利于内外和谐发展。并因当时环境，激发儒家“齐家治国”、家国一体观念，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制度只有与社会上普遍的意识形态相适应才能发挥其作用。”作者详细

分析了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经营理念的社会适应性与合理性，也逐一指出它的落后性，认为它“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一致的”。因而结论比较悲观：“从历史发展看，企业家的观念没有重大的改变，非正式制度没有重大的发展，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本书《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一文，集中研究了家族企业制度。受儒家思想熏陶，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发展中，企业家也用忠诚笃敬的儒家伦理培训员工，将企业办成一个大家庭，同食共宿，甚至设置义冢。又将家族观念扩大及于乡土，结成同乡帮派，建立会馆，竞逐于市场。这种族谊、乡谊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成为信用交易、合同承诺、人事荐举、担保的基础。作者前已有关于儒家伦理作为企业制度的论著，着重分析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本文则同时分析了它的负面作用，如分家析产造成企业的分崩离散；对异姓人员的不信任不利于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妨碍企业的规模经营；排斥外界融资，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等。还有个特点，盖论意识形态常重论经史，本文则所有论点都有经验实证，即据历史上已发展并有结局的事情立论，实为难得的史笔。

关于意识形态，我想再谈点个人看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亦应从制度变迁上考察其历史作用。意识形态的变迁并不与经济发展同步，不可以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思想意识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未说明其规律。大体看来，意识形态中伦理道德部分的变迁是缓慢的，常会“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它（甚至最保守的宗教信仰部分）也会有革命性变迁，以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即历史上所称的“启蒙”运动。

伦理道德“落后”于经济发展要求不一定是它本身的弊病，以近代西方而论，乃是因为启蒙运动以后，经济发展走入歧

途，背离了道德理性（价值理性）。反映在经济学上，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只是用作分析手段，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真人仍保留他《道德情操论》中的角色。李嘉图开始淡化道德原则，到新古典主义就完全抛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变成唯一信条，经济学变成典型的工具理性。20世纪，西方经济的发展终于陷入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社会动荡、战争不息、难以持续发展的危机。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急谋补救之方。人们认为不能放弃道德理性，有人提出伦理经济学，甚焉者乃至完全否定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理论。

道格拉斯·诺思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是在新古典主义结构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论和意识形态两大支柱。据说这种增加是得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框架。不过，在诺思的历史分析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远逊于国家论。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对正式制度公正性或公平性的评判，而伦理道德只是“约束”个人行为，以克服诸如“白搭车”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论点恐怕过于狭隘。我以为，我国儒家思想早已融合了道家、法家思想，在17世纪并有了一次颇为热烈但终被扼杀的启蒙思想，19世纪后期又吸收了若干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思维。在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有它的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我们倡导“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际，也还有它积极的作用。

2005年2月

目 录

序	(1)
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的三种类型 ——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心	(1)
张忠民：略论抗战时期内地省区企业公司的制度特征	(26)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 ——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	(46)
李 玉：中国近代合伙股份产权变更方式管窥 ——以北洋政府时期的报刊广告为视域	(67)
黄汉民：荣氏家族企业的公司制度变革	(84)
潘必胜：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结构	(105)
杨在军：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	(124)
宋美云：试论近代天津企业规模化发展路径	(137)
陆兴龙：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发展和制度演进	(156)
李一翔：银行的“钱庄化”与钱庄的“银行化” ——近代中国金融企业发展模式探析	(171)
刘兰兮：近代北京传统银钱组织的变迁	(185)
林 刚：简析大隆机器厂的“铁棉联营”	(204)
王小嘉：近代中国企业包工制度新探	(219)

杜恂诚：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	(234)
王玉茹、刘卓君：非正式制度约束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 企业经营理念·····	(253)
徐建生：民国政府的经济法规与近代企业发展·····	(271)
张忠民、朱 婷：1927—1937：南京政府国有经济政策述论 ·····	(289)
毛小敏、赵 津：企业外部环境与企业的成长 ——以久大精盐公司为例·····	(314)
高超群：民生精神的意义及其实践·····	(329)
魏明孔：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发展演变述论·····	(345)
徐卫国：中国近代邮政的经营管理述论（1896—1936）···	(361)
袁为鹏：聚集与扩散：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地理分布初探 （1890—1936）·····	(382)
纪 辛：1927—1937年国家资本主义在矿业中的恢复 ——以煤矿业为例·····	(401)
后 记·····	(423)

试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 股份制企业的三种类型^①

——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心

朱荫贵

股份制企业是以股份形式将分散的私人资本和其他形式资本集中起来设立的企业，是商品和信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出现后的标志。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诞生，标志着这种从西方引进的新型资本组织的企业形式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此后，由于这种资本组织形式具有集资广泛、迅速以及集资本成本低，并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等特点，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新式工商企业主流的资本组织形式。^②但是，因为股份制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资本的组织形式，因此，在近代中国，它并非只以单一的一种方式出现。例如，从存在时段、筹资形式、资本来源、资本性质和经营主体等方面考察，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就至少出现过“官督商办”、民族资本以及国家资

① 本文是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批准号04BZS030）的阶段性成果。

② 例如1928年以前登记注册的公司数一共为716家，到1935年6月止增加到2682家。1928年2月至1935年6月间注册登记的就有1966家，是此前的2.74倍。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又占绝对统治地位，占登记注册总数的70.4%，资本数占94.37%。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9页。

本股份制等三大类型。^① 这三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并以先后递进、交叉并列的方式存在于近代中国，三者有相同的一面，相异的一面也十分明显。

本文拟对这三种类型中的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进行粗浅分析，以为引玉之砖。

由于学界过去对国家资本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关注不够，尚无专文论述，因此这里首先需要对“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一词进行界定。按照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②，以此为依据，再结合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国家政权控制的股份制企业”应是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具有的最基本特征。这里所说的“国家政权控制”，主要以国有股份占多数并对企业具有“控股”权，以及企业的发起和管理者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并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方向具有绝对控制权而言。

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主要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并且，这时期具有“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类型特征的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也并非完全相同，仅从其产生的途径和存在形式而言，就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

① 关于这三种股份制企业的共同和不同点，将另作专文论述。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27页。过去，中国学术界更多提到的官僚资本主义，因为界限不清或政治含义明显，近年来引起很多争议。因此，有人主张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官僚资本主义，许涤新、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就认为“中国官僚资本的实质就是在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见该书第三卷，第12页）。笔者认为用国家资本主义比官僚资本主义语义明确，界限容易界定，而且经济范畴清楚，因此认同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说法。

一、类型之一：通过强行参股形式产生的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

这种类型的企业，顾名思义，在此前时期大体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资本类型的股份制企业，但在某种时期某种力量的作用下企业性质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成为国家资本性质的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变化性质发生改变的最典型案例，可以举大家都很熟悉的1935年中国银行的改组为例进行分析。

中国银行的历史可上溯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的户部银行，是中国自办银行的第二家，仅次于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1912年改组为中国银行，1928年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虽然长期承担过国家银行的职能，但从资本组织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从1917年张嘉璈当选董事和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起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强行增加官股为止，始终是民间资本占优势的民族资本股份制企业。^①

中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占有独特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其历史长、规模大、资本雄厚，也不仅因为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1916年抗拒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从而在社会上奠定了坚固的信用基础，并取得中国银行业的“龙头”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张嘉璈为首的经营管理者坚持独立经营、服务社会，建立和形成了一系列有形无形的理念和经营方式，成为

^① 据邓先宏的研究，中国银行的商股比例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1922年为88.87%，从1923年至1926年一直占97.47%。见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356页“中国银行官商股份变化情况一览表”。

当时中国最成功的民族资本股份制银行。这一点，正如张嘉璈本人所说：“自拒抗袁世凯停兑命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惟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及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对于中国银行取得的成绩，张嘉璈不无自豪，“民国十七年（1928）底，亦即改组之前夕，其发行额增至二亿七千万元，存款额增至四亿元。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他总结中国银行当时能够取得这种成就的“重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此前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发展和舆论作用，使得“尊重私人企业之思想”，尚“凝结于一般旧式军阀脑筋之中，不敢肆意摈斥”。而且，“通商口岸所培养之舆论”，也“足使军人政客频加尊重，不敢蔑视”。另一个原因，则是国民党刚刚取得政权，“自知本身实力尚待养成，不得不利用社会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础之事业，巩固其地位”。^①这是1928年张嘉璈在中国银行被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占据中国银行总股本2500万元五分之一的股份时所说的话。但到国民党政府巩固政权之后的1935年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20世纪30年代，是国内外危机重重的时代。世界经济危机和美国购银风潮引发了国内的金融危机，加上长江水灾、东北“九一八”事变和内地农村破产等等，使国内经济恐慌更显严重。1935年，金融和经济状况已处于危险之边缘。这种状况，给长期力图控制中国银行的国民党政权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构成近代

^① 上引均见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社1982年版，第86~87页。